



汉语国际教育青年学者文库 主编：张旺熹

汉语国际教育 语境中的文化张力

■ 李春雨 / 著

海外借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汉语国际教育青年学者文库 主编：张旺熹

汉语国际教育 语境中的文化张力

■ 李春雨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中的文化张力 / 李春雨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8.12

(汉语国际教育青年学者文库 / 张旺熹主编)

ISBN 978-7-5192-5582-4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②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 H195.3 ②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6345 号

书 名 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中的文化张力
HANYU GUOJI JIAOYU YUJING ZHONG DE WENHUA ZHANGLI

著 者 李春雨
责任编辑 宋丽萍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5582-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文学、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自序）

近些年来，我围绕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在三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点成果：一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从硕士到博士期间专心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文学史的发展流脉和文学场域的变迁，以及经典作家生成的意义和影响；二是在文学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向文化领域的拓展，特别是以京派文化为中心，探究了文学与文化广泛而深刻的互动关系；三是我到北京语言大学以后，迄今为止一直致力于国际汉语教育所思考的问题，重点是留学生教学的课堂内外教材编写以及以孔子学院为重点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考察、以美国大学在中国的汉语项目为例对“外国文化走进来”的关注等。现在汉语学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使我得以把自己以往的研究回顾和整理，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对自己研究成果认真反思的良机。而在整理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以往三个方面的研究正好构成一种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对文学的理解在根本上是对人的理解，因而也就是对文化的根本理解，是对时代历史的根本理解，是对世界的根本理解，这是我的研究视域和形态不断延伸和拓展的支点和基础；对文化的观照则把我的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加开阔的层面、一个更加复杂的情境和一种更加深刻的语境之中，在文学和文化的互融互动中，文学独自の天地和文化宽泛的视野有了一种有机的契合，在文学与文化之间领悟到许多独特的意蕴和精神；而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实践和理论思考，直接把我的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融汇到中国与世界交流与碰撞的时代大潮里面，它需要我回答甚至解决诸如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在北京语言大学乃至在中国有什么特点，中外留学生教育模式的异同是什么，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最缺失的环节与内涵又是什么等一系列迫切

而重要的问题。虽然我的工作还处在探索之中，但这毕竟让我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文学与文化夯实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又给了文学与文化更大的阐释空间。我兴奋又惶恐，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促使我珍惜难得的机遇。还有一点似乎应该谈到的，就是我今年获得了两项课题：一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重大课题“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模式研究”，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学背景下五四新文学价值建构研究”。这两个课题和我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又构成一种融合，文学、文化、汉语国际教育，几乎是这两个课题的关键词，学识的结构与研究的结构能有某些融通，在某种程度上能更好地激发一个人的创新潜能和探索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由衷地感谢汉语学部为我们提供的这次机会。

我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文化的思考，特别是对传播文化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关系”，博士论文写的是“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因此，我比较关注文学现象的文化背景，关注作家与出版环节的关系，关注作品创作与读者接受的关系等，这种多重关系，能够更加立体地、多维地考察文学的本质和文化的作用。这种多侧面的考察视角，让我充分感受到文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一文中，不是单向度地阐述鲁迅杂文的深刻性和艺术性，而是把鲁迅杂文的成熟和老辣，放在传播平台上和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来审视，这就不仅看到鲁迅杂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更多地看到在同一刊物上鲁迅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看到鲁迅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文化情景下写这些文章的，看到读者与评论家对鲁迅作品有什么看法，甚至可以看到鲁迅与刊物、与读者之间的默契和互动。这样的考察使鲁迅杂文就不单单是鲁迅自己的事了，鲁迅的杂文创作就活起来了，鲁迅杂文创作的整个过程就清晰多了，鲁迅杂文的价值和影响也更具体更落实了。我在《〈新青年〉与百年中国的文化焦虑》一文中也着重探究了在中国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青年》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念，也带来了百年中国的文化焦虑，新思潮与旧理念、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个《新青年》所能解决的。《新青年》特别是它

推出的大批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它也带来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难境地和种种窘况，这就是文学与文化的交织与绞缠。其实，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五四那个时期，这些问题是动态发展的，五四存在，今天也存在，甚至将来还是存在的。这是《新青年》除了自身价值以外给我们的多一份思考。

由于我在文学研究的起点之处，较多地看到了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因此在我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就担心把文化泛化了、简单化了。文化的确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但我们面对文化并把它当作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时，应该看到，文化又是具体的、明确的，有时甚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选择了京派文化作为研究的具体内容。当我把京派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对象来研究时，竟然发现文化是那么的琐细，那么的可观、可感、可触摸。同时，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来自某一地域的，但文化一经形成就又不仅仅属于某一地域了。在对京派文化的考察中，我深感文化既有地域性，又有超地域性。这些思路使我获得了一个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京派文化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通过课题研究，我加深了对文化特性的理解，也加深了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文化绝不只是文学的背景，文化也是文学的内涵，甚至文学的样式、文学的语言、文学的风格，都是与文化有关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并使我增强了一种辩证的思路，任何事物的宽与窄、深与浅、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文学与文化，并不存在你深我浅、你宽我窄、你新我旧的问题，而是互动互联的、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

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与科研，是我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的一个汇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汇合点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我充分而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与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汉语国际教育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而一定是伴随着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教育。没有对文化的理解，没有对文学的感受，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失去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与感受，甚至可以说失去了对人和人性的根本理解和感受。哪有在一个几乎真空的状况下进行

语言教学的呢！那样的语言教学还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我尤其感受到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分量。任何一个国家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不能把他（她）对当下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与他（她）正在学习的汉语很好地结合起来，怎么能够单纯地学好语言呢！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正是留学生多视角、多侧面、多方位地了解 and 认识中国社会和民族特点的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途径。当然，除了中国当代的文学与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学与文化同样是留学生走进中国的必备通道。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就是强调文学与文化（无论是现当代的还是古代的），必须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是和汉语教学融为一体的、不可剥离的一个有机整体。但现实告诉我，这个追求并不简单，要真正很好地实现它就更不容易。不过我有信心，因为中国和北语都已走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为什么叫“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不是“中国语言走出去”？我想，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关系的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现实层面为它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而我只是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尽一份自己的责任而已。

目 录

上篇 文学史的场域与流变

- 《新青年》与百年中国的文化焦虑3
- 中国现代连载小说的文体意识和文体结构15
- 论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群体的关系27
- 接受与生成的互动
- 读者对现代文学生存状态的独特意义43
- 《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57

中篇 “京派”与“京味”的文化思考

- 穿越时空的“京味”文学71
- 文化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张力85
- 废名小说的文学空间与文化空间99
- 从李健吾看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106
- 老舍影响下“京味”戏剧影视的发展与新变118

下篇 汉语教育与文化传播

- 文学教材编写与汉语国际教育131

北京文化与汉语国际推广	139
北京文化的异域审视	
——针对在京留学生群体的考察	154
美国高校在京汉语项目之考察	164
转型中的汉语国际教育	196

上篇

文学史的场域与流变

《新青年》与百年中国的文化焦虑

中国现代连载小说的文体意识和文体结构

论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群体的关系

接受与生成的互动

《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

《新青年》与百年中国的文化焦虑^①

《新青年》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出场，有各种各样具体复杂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文化万分焦虑的结果。当时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走到一个亟待更新的关口，而世界各地的外来文化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本土文化构成了不可阻隔的交流之势，《新青年》顺势而出，担当了与国人共同思考文化前途与民族命运的重任。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估量《新青年》的历史价值时，竟然发现，当年中国的文化焦虑伴随着《新青年》的登场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不断融入新的更为复杂的内涵。我们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将百年的文化焦虑全部加以梳理，但可以试着去追踪引起《新青年》知识群体焦虑的最深层的动因，也就是他们企图用文化唤醒国民之时所面临的两个对象——文化与民众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处理？国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样让民众更好地接受新的文化？这是《新青年》创办之时同人们苦思冥想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回首这本杂志对百年中国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或许，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论《新青年》更重要的意义。

1. 激进的文化姿态与深沉的价值取向

《新青年》的出现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开始，也是古老中国觉醒的开始，列强不断侵入，战争接连失败，而国人仍然麻木不仁，沉睡了千年的中国已

^① 本文作者系李春雨、郝思聪。

经岌岌可危。孙中山率领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只要中国无数的华老栓、华小栓们还吃着革命烈士的“人血馒头”，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转型。这足以说明，文化觉醒才是现代转型中最重要问题，一群知识分子用笔杆以《新青年》为阵地扛起了这个重任。纵观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他们都是从不同专业转向文学和投入文化的。这也表明对国民实行思想启蒙是“五四”一代人的共识，事实证明，《新青年》扛得起这个历史重任。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从来都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诸子百家、秦汉散文、盛唐气象等，就像历史文化天空中璀璨的明珠，积淀着中国文化的灵性与精华，但当1840年西方国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人们才惊觉这维持了几千年的骄傲早已落后于世界之潮流。胡适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不但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①这连续九个“不如人”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危机意识和焦虑心态。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之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引进。

在《新青年》走过了一百年历程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特定历史情况下如何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化焦虑，关注面对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新青年”知识群体是怎么样处理这种焦虑，关注在这样焦虑诞生下的《新青年》留给后人的思考和价值是什么，这样《新青年》的本质面貌才会真正凸显，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谈论《新青年》的根本意义。

毋庸置疑，《新青年》是激进的，它新就新在这种激进的态度。《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痛斥“忠孝节义”为“奴隶之道德”，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②，同样，另一位文化先驱李大钊认为中国文化因为“守静的态

① 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度”“持静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潮流，面对现代“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因为“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必然被‘淘汰’而‘归于消亡’”^①。更甚者有钱玄同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提倡废除汉字，他认为：“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故有二：（1）因国人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2）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②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将中国人与狗并为一谈，由此批判中国人的“缺乏责任心”：“有一天我们问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他只训练外国的狗？他回答说：‘中国的狗也很聪明；他们的嗅觉竟比外国的狗还灵，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何以中国狗这样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③

《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在文化立场和文化姿态上都表现得相当激进。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异常激进的新文化旗手，个个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有着深厚国学底蕴的饱学之士，并且当这些《新青年》的铁笔杆在自身的生活中面临与传统文化对峙时，也耐人寻味地不那么激烈了。胡适、鲁迅等人都沉默地应许了家庭的包办婚姻；陈独秀更是在17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并且终身都在对音韵训诂进行考据研究；钱玄同虽然提出要废除汉字，但其自身是位古文大家，精通经学、史学和小学；蔡元培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21岁中举人；胡适还曾在1923年与梁启超一道向广大青年学生开列了一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② 钱玄同：《答复陈独秀关于〈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③ 傅斯年：《中国人和中国狗》，《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列之书范围涉及经学小学理学各类文典，在文学方面更是包含历代名人诗文专集及宋元以来词曲小说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打倒孔家店”，多少年来人们都将“打倒孔家店”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精神，并普遍认为是胡适提出来的主张，事实上，当我们去查询历史资料，只找到了1921年6月16日胡适曾在《〈吴虞文录〉序》中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奇怪的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打孔家店”逐渐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这一说法。二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打孔家店”不过是把这孔家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对于世人的误解，胡适曾这样表示：“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①

这样看来，新青年派的学术选择甚至是人生选择与他们在言论上的激烈批判异乎寻常地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五四”一代人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恰恰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新青年》再激进，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时代特征。它的主笔们大多都是从“旧营垒”中冲出来的，无论如何叛逆、如何先锋，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染缸”中浸润出来的特性，他们亲身感受过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弊害，这使得他们对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批判能够一针见血，但在潜意识中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文化的羁绊，这是后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文化资源和心理状态，也是《新青年》在先锋之余更显深刻、厚重、凝练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新青年》上曾经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甚至是全面否定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了，鲁迅的一个比喻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

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求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①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面对中国几千年来文化惰性的折中调和的言论和主张远不如投枪匕首来得有效，为了刺痛中国人的神经，为了让国人痛定思痛，“新青年”同人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大都异常犀利，因为他们知道强大惰性的传统文化自然会折中调和。胡适的这一番话更加直接地点明了这一点：“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中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的。”^②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去凭借只言片语就断定《新青年》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激进杂志，在经过了多年春风细雨般的改良措施都无效的情况下，只有“拆房”的言论或许才能给黑暗中的中国打开一扇光明和希望之“窗”。今天我们看来，或许新青年派同人们的口气都带有那么一点不容商量的霸道，但结合着时代因素下的文化焦虑来思考，我们便能理解“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激进之外的良苦用心。

2. 犀利的国民性批判与深切的个人价值关怀

归根到底，文化与人是息息相关的，它衍生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并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文化转型和文化批判就不得不落实到“人”身上来。同样，《新青年》对传统文化解构与新文化建构的努力也离不开对“人”的探讨，当批判对象由个人扩展到一个集体或者是一个民族之时，这便是国民性的批判。

在“新青年”派知识分子看来，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之所以饱受侵

① 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②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

略，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国民性出了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和中华民族才能“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①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把中国的衰亡归结为中国的国民性。他用“陈腐朽败者”来隐喻中国的青年，他说：“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真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②他在《青年杂志》上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抵抗力》更加明确了这点：“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惰性，腾笑万国。”他认为“抵抗力”之薄弱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意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③。

在西方一些学说中，国民性的优劣是很难改变的，比如孟德斯鸠主张国民性格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赫尔德更认为国民性格是种族遗传而来。但《新青年》同人们显然不那么认为，他们执着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事实证明，百年之前的《新青年》具有极其精准的批判眼光，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停止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新青年》上多篇文章皆认为，中国国民性并不是天生卑弱，而是受制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且不堪矣。”^④封建君主“大盗”式的专制制度，中国熟人社会中伦理、风俗、道德的“乡愿”式束缚，人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从属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直接导致了“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⑤。

因此，将个人从专制制度和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国民性的改造是《新青年》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落脚点。据统计，在1915年到1926年《新青

①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③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④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民彝》创刊号，1916年5月15日。

⑤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